

陈云与三年困难时期的救灾工作*

尚长风 刘 春

【提 要】由于政策失误以及自然灾害等原因,1959年—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我国发生严重灾荒。1958年,陈云因为领导“反冒进”,曾受到严厉批判,处境艰难。在灾荒早期,陈云就出现的问题,采取力所能及的措施,力求把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当灾荒全面暴露以后,陈云把缓解灾情、安排好人民生活作为自己在这时期的主要工作。为此,陈云提出了一系列救灾措施。主要有:紧急进口粮食、精简城镇人口、救济城镇人口、调整党的农村政策等。

【关键词】陈云 三年困难时期 “反冒进”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2)06-0124-07

一、历史背景

早在1956年,由于经济工作中出现了急躁冒进,周恩来、陈云等提出既要反保守,又要反冒进。但是,在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后,这种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正确方针,受到了错误的批判。陈云因此被迫多次检讨。“大跃进”运动开始后,陈云虽然担任财经小组组长,但已经失去对经济工作的主导权。

由于“大跃进”运动背离了经济发展规律,1959年—1961年,我国遭遇严重饥荒。1960年与1957年相比,粮食的人均占有量下降29.7%。^①全国城乡大面积出现浮肿病现象,有的地区出现非正常死亡情况。

陈云较早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问题,多次冲破各种阻挠,采取力所能及的措施,以图缓解灾荒。1959年6月,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毛泽东想到了陈云。他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经济工作还是要陈

云出来。^②

但是,由于当年庐山会议后开始了“反右倾”运动,陈云再次被指为“右倾”,处境愈加被动。所以,1959年3月到1960年7月,陈云一直没有担负实际工作。^③

1960年以后,严酷的灾情暴露出来。6月,毛泽东作《十年总结》,他说:“1956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农业方面则犯了错误,指标高了,以至不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建国以来党处理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历史考察与经验研究》(11BDJ018)的阶段性成果。

① 朱荣等编《当代中国的农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187页。

②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③ 金冲及等编《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4页。

可能完成。”^① 在这一讲话中，实际上毛泽东就批判“反冒进”，间接地向周恩来、陈云作了自我批评。此后，“大跃进”运动逐渐偃旗息鼓，国民经济进入了调整的轨道。陈云的政治处境也有所好转，为缓解已经出现的饿死人、浮肿病等严重局面，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二、首倡并领导进口粮食工作

建国以后到1960年，中国一直是粮食净出口国，每年出口相当数量的粮食，以换取外汇，加快工业化进程。然而，为应对突发的灾荒，陈云提出的第一个应急之策就是进口粮食。

（一）首倡进口粮食

1960年底，陈云经过考察，发现粮食生产短期不可能恢复。在很难渡过饥荒的情况下，陈云考虑进口粮食问题。当时，提出这一意见是有风险的。因为过去我们把进口粮食同“卖国贼”、“修正主义”相联系。但是，不进口粮食，人民就要挨饿。因此，陈云大胆主张进口粮食。

根据陈云的意见，1960年11月29日，李先念给毛泽东、周恩来等写信，正式提出进口粮食的建议。李先念在信中说：“面临着明年春荒的困难，必须坚决克服这个困难。克服这个临时困难的办法，除中央一系列方针政策之外，考虑进口12亿斤粮食或者更多一些的粮食是必要的。拿到这批刀口上的粮食，对争取国内粮食局势的基本稳定，渡过灾荒大有好处。”毛泽东于12月12日晨批示：“退先念同志。完全同意。能进口二十亿斤，更好。”^②

为了迅速而有效地缓解粮食紧张状况，陈云主张“进口粮食，能进多少就进多少，我以为要‘吃饭第一，建设第二’。”^③ 陈云的意见为中央所接受。因此，粮食进口的规模迅速扩大。1961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广州会议上正式作出了1961年进口粮食500万吨、翌年进口350万吨至400万吨的决定。^④

为降低粮食进口成本，陈云还提议通过第三国转口美国粮食。当时美国是世界粮食市场

的最大供应国，报价也较低，但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选择进口国时有意回避。1961年上半年，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宣传（本国）自然灾害，“放出卖粮食不能迟期付款的空气；可能还要涨价”。^⑤ 在这种情况下，陈云考虑到经济上的合理性，认为国家宝贵的外汇应当精打细算地使用。在1961年8月的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向毛泽东提出，可否通过当时同中国关系比较密切的法国转口购买美国粮食，毛泽东表示可以。^⑥ 不久后，美国粮食也通过转口，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

（二）指导进口粮食的接卸工作

由于灾情来势凶猛，能否把进口粮食及时运到缺粮地区就成为性命攸关的大事；同时，当时港口的吞吐和运输能力都很薄弱，因此，进口粮食的接卸、转运困难很多。

为了安排好进口粮的接卸工作，1961年2月，陈云不顾身体虚弱，到天津新港码头调查、指导进口粮食的接卸工作。针对出现的问题，陈云于2月11日写信给周恩来：“新港码头去看了一下，估计外国轮船可能不同意我们用铁‘抓斗’，因为容易碰坏船。这次捷克船就碰坏了三处，修好后出港。不用铁‘抓斗’，就用‘帆布抓斗’，由于不能自动化的‘抓’、‘放’，工效差百分之五十，这就可能延长卸粮时间。”周恩来也十分重视这件事，第二天就将陈云的信批送刘少奇、彭真、谭震林阅。^⑦

使用“帆布抓斗”，虽然减少了撒漏，但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20页。

② 蒋冠庄、高敬增：《李先念呕心呕血粮荒——六十年代初的粮食危机》，《百年潮》2008年第1期。

③ 逢先知等编《毛泽东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1页。

④ 赵发生：《忆陈云同志对粮食工作的指导》，《缅怀陈云》编辑组编《缅怀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84页。

⑤ 《先念同志关于农产品收购价格方面的情况和问题的报告》，1961年7月6日。

⑥ 金冲及等编《陈云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1页。

⑦ 金冲及等编《陈云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6、1227页。

“帆布抓斗”速度较慢。后经沈鸿和粮食部的傅立民共同研究，突击抢制出了真空吸粮机，把粮食从船上吸出来。^①另外，中国在订货时也要要求外方提供真空吸粮机。这就不仅克服了粮食撒漏现象，而且卸运速度大为加快。陈云亲自过问并亲临视察到港粮食的卸船和接运情况，可见他对进口粮食工作的重视和细心，促进了粮食接卸工作的改进。

陈云大力推动的粮食进口工作，使国家在解城市粮食供应“燃眉之急”的同时，减少了对农村的粮食征购，从而有效缓解了城乡粮食紧张局面。

三、主张精简城镇人口

受“大跃进”中浮夸风的影响，城市人口迅速膨胀。最大恶果是对商品粮的需求急剧增加。因此，在1959年、1960年粮食产量连续减产的情况下，粮食净征购量仍然提高到占粮食总产量的28.0%和21.5%，远高于1957年17.4%的水平。^②高征购使农民口粮普遍严重不足。

陈云一贯主张限制农村劳动力盲目来到城市。早在1959年4月，陈云就明确提出，要把从农村多招的工人精简回农村去。他在给中央财经小组的信中指出，要认真精简去年多招收的工人。企业增加职工，就要随之增加购买力。在农村增加劳动力，相应地增加购买力并不可怕，因为同时会增加一些农副产品的供应数量。^③

尽管形势严峻，但大规模精简城镇职工意味着工业化进程的倒退。一些经济部门的领导干部，几年来习惯于铺摊子，对存在的困难认识不足，还在等待观望。以致有些厂长议论道：“调整减人，举棋不定，思想混乱，工作被动”。^④

针对上述情况，陈云作了深入的思想动员工作。1961年5月31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面前摆着两条路要我们选择：一个是继续挖农民的口粮；一个是城市人口下乡。两条路必须

选一条，没有什么别的路可走。我认为只能走压缩城市人口这条路”。陈云进一步分析道：“工人头一年下去，每人每年一般可以少供应150斤粮食，下去1000万人就是15亿斤，2000万人就是30亿斤。这是第一年的差别。更显著的差别还在第二年。原来家在农村的工人回了老家，原来家在城市的工人到农村安家落户，参加集体生产和分配了，加上自留地有收成了，他们就不要国家供应粮食了。这样，下乡1000万人就可以少供应粮食45亿斤，2000万人就是90亿斤。”他还指出，工人回乡，总可以生产出一些东西出来，多增产一些粮食和其它农副产品。^⑤

陈云的讲话，使与会者对粮食问题的严重性和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的必要性，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坚定了精简城镇人口的决心。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在1960年年底1.29亿城镇人口的基数上，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人以上，1961年内争取至少减1000万人，1962年至少800万人，1963年上半年扫尾。^⑥

1962年初，灾情有所缓解，有的领导干部对精简职工必要性的认识有所动摇；同时，这一时期需要精简的职工已在城市长期居住，对回到农村有较强的抵触情绪。针对这些情况，在西楼会议上，陈云指出：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这是克服困难的一项根本性的措施。……要精简的职工，不单是来自农村的人，还有一部分城市的人。减下来后都要作适当的安排。如纺织工人，大多是城里人，现在很多

① 杨少桥：《为民食竭尽心力》。《怀念李先念同志》编写组：《伟大的人民公仆 怀念李先念同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51页。

②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第393页。

③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89页。

④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四）》，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641页。

⑤ 《陈云文选（1956—1985年）》，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2、160页。

⑥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12、413页。

纺织厂不能开工，也只能多做思想工作，把道理向工人说清楚。^①

陈云的观点鲜明有力，推动了精简工作的深入开展。据统计，自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全国职工减少1887万人，城镇人口减少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数减少2800万人。^②由于城镇人口减少，粮食购销量相应减少。农民留粮水平由1961年的人均154公斤（贸易粮，下同），增加到1962年的161公斤。^③这对于缓解农村灾情具有重大意义。

四、救济城镇人口

1960年下半年以后，农村灾情逐步暴露。这样，国家已不可能从农村征购到足够的粮食供应城市居民。因此，城市居民生活水平大幅降低，饥馑由农村向城市蔓延。连一向十分有保障的城市机关干部们的生存也受到威胁，如“山东省财政厅现有人员54人，得浮肿病的有19人，占总人数的35%。……浮肿病的情况，其它机关也有。”^④不安情绪在城市居民中蔓延。许多职工在工作当中敷衍了事、节省体力；下班后，则千方百计地去搞吃的。城市中的工作受到很大影响。

面对这种局面，陈云十分担忧。他认为，目前，这样的问题，是国家大事。如6000多万人身体搞得不好，我们不切实想办法解决，群众是会有意见的。^⑤为此，陈云提出了一些应对办法。

（一）增加居民营养

针对城市居民中浮肿病人增多的情况，陈云提出分几步做到城市每人每月供应3斤大豆，夏天和蔬菜多的地区可以少一点。他认为这个办法，不仅可以保证城市人民的健康，而且可以提高一点职工的实际工资。有了豆子吃，或者换豆腐吃，就可以不买或少买自由市场上的高价副食品。

陈云经过计算，认为，1亿城市人口，实行这个办法，每年需要30亿斤大豆。我国每年大豆的产量，在1958年以前是190亿斤左右，1961年是120亿斤，拿出30亿斤来供应城市，

是可能的。我们应该力求在两年内逐步做到这一点。第一步可以先在大中城市的6000多万人口中实行。^⑥

为进一步改善城市居民的营养水平。陈云提出，拨一点钢材，制造一些机帆船，增添一些捕鱼网具，让水产部门出海多捕一些鱼。如果1年增产15万吨鱼，就可以使大中城市的6000多万人平均每人每月有半斤鱼吃。陈云还设想，除了每人半斤鱼，到1963年年底，大中城市的6000多万人，每人每月可以增加半斤肉。他根据姚依林提供的情况说，当年计划收购1200万头猪，每头按60斤净肉计算，共有7亿多斤。这样，鱼、肉两项，5口之家一月就有5斤。^⑦

（二）缓解通货膨胀

在饥荒的背景下，通货膨胀加剧，而职工工资没有上涨，这加重了城市居民生活困难。正如陈云所指出的：“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够，物价上涨，实际工资下降很多。”^⑧

治理通货膨胀，成为缓解城市紧张状况的当务之急。为此，陈云主张出售高价商品。早在1960年8月8日，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关于饮食业实行凭证供应的意见，同意保留少数高级饭馆可以不凭票，实行高价销售。这一办法逐渐在一些大中城市推广。后来又增加了高价糕点、高价糖果。

1961年1月19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

①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1页。

② 苏维民：《杨尚昆与三年困难时期精减城市人口和职工》，《百年潮》2008年第10期。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计划司：《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1949—1986）》，农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576页。

④ “中央批转开封、济南二市发生浮肿病的材料”，1960年11月23日。

⑤ 《陈云文选（1956—1985年）》，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0页。

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编《中国工业五十年（四）》上卷，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696页。

⑦ 《陈云文选（1956—1985年）》，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0页。

⑧ 孙业礼等：《陈云的非常之路》，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6页。

讲话,对出售高价糕点、高价糖果十分支持,鼓励商业部门放手卖。陈云认为,在供应紧张的时候,总要网开一面。陈云总结了这样做的三大好处,一是可以缓和人心,二是可以增加点营养,三是可以回笼货币。^①

出售高价商品的举措,实际上是利用市场的办法解决问题,产生了积极的效果。据曾参与高价商品出售的薛暮桥回忆:陈云建议出售高价糖果点心、开高价饭馆、出售部分高档的高价工业品,借此回笼货币,稳定物价。在三、四年间靠出售高价商品共计多回笼货币50亿元,相当于1961年货币发行总额的40%,为稳定物价创造了条件。^②

在国力有限的情况下,通过给城市居民供应少许黄豆、肉类,以及缓解通货膨胀,有效改善了城市居民的生活。

五、调整党的农村政策

三年困难时期灾荒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策失误造成的。因此,为了从根本上克服灾荒,陈云提出了一系列富有远见卓识的政策调整建议。

(一) 主张减少粮食征购

从50年代初起,为加快工业化,国家向农村大量提取生产剩余。占有农业剩余的主要手段是实行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大跃进”时期,受浮夸风影响,许多地方虚报粮食产量,导致了超额征购。在实行统购统销之后,按正常的征购率,中国农村居民的留粮也仅能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因此,在粮食产量下降的情况下,高征购率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面对这种局面,陈云指出,农民最后还是要看我们征购多少。如果征购数量还是那么多,农民还是吃不饱,那末,他们的积极性仍然不会高。^③

由于各地灾荒严重,征购粮食的主要对象,只能是少数高产的地区。针对这种情况,陈云指出,向他们多要,一年还可以,长期下去不行。像黑龙江、杭嘉湖等商品粮产区,如果长期吃粮标准很低,他们增产的积极性就没有了,

高产区会变成低产区。全国高产县并不多,浙江省有23个县,担负了全省征购粮总数的74%。江苏省苏州专区6个县,征购12亿斤稻谷,上缴中央和供应南京市的粮食,主要靠这个专区。把这些高产区的积极性打下去,对我国农业的发展非常不利。

他指出,再挖下去,农民口粮不够,人会把饲料拿来吃掉,牲口势必继续大量死亡,这对农业的损失就太大了。^④(当时农村主要依靠大牲口耕作)

陈云的意见得到中央的赞同。1961年7月1日到1962年6月30日这一个粮食年度,征购粮食的实际数是679亿斤(贸易粮,下同),比上一个年度(即1960年7月1日到1961年6月30日)实际征购数837亿斤,减少158亿斤,折合原粮190亿斤。全国平均每个农民少缴售30多斤,相当于每人一个月的口粮。^⑤

(二) 调整农村生产关系

“大跃进”运动中,全国普遍建立了农村人民公社。平均主义泛滥,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通过调查研究,陈云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在此基础上,陈云指出:“搞平均主义,大大降低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要增产,第一靠政策。”^⑥“政策问题不解决,农民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其他的措施再多,农业生产也上不去。”^⑦

第一,建议为农民留足自留地。

为了弥补集体经济的不足,早在初级社时,国家就决定留少量自留地给农民个人经

① 参见《陈云文选(1956—1985年)》,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3页。

② 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编辑组:《陈云与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1页。

③ 《陈云文选(1956—1985年)》,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2页。

④ 参见《陈云文选(1956—1985年)》,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4、155页。

⑤ 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1962年7月28日。

⑥ 朱佳木主编《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73页。

⑦ 金冲及等编《陈云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256页。

营。但在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农民的自留地被取消。自留地取消之后，农民只有从集体方面获得活命口粮。当集体的粮食由于高征购和公共食堂的浪费等原因而出现不足时，农民毫无后手。

在青浦的调查中，陈云发现，与当时集体经济活力不足相比，自留地有着相对较高的收成。陈云感慨道：农民有了自留地，我就放心了，不会饿死人了。农民没有粮食吃呀。中国的农民真好，饿死人不想起来造反。中国历来农民造反，都是在粮食问题上造反的。有自留地，农民就安定了，自留地要留足！^①

调查结束后，陈云向中央写了题为《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农民种自留地，可以种得很好，单位面积产量比生产队高。增加一点自留地，可以使农民的口粮得到一些补充，生活有所改善。”^②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自留地实际上成为农民的保命地。陈云关于留足自留地的主张，促进了农民自留地的恢复。这对于尽快走出灾荒产生了积极作用。

第二，主张母猪私养。

“大跃进”时期，农民私人养猪被看作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屡次予以禁止。但是，集体养猪，由于激励不足，很快出现产量、质量下降的问题。据统计，全国生猪的存栏数由1957年的14589万头下降到1960年的8226万头。^③而且出栏的生猪瘦小，如供应香港的猪，被拒收，说是狗。为了迅速改变这种情况，中央确定“公私并举，私养为主”的方针，

但是，在当时让小生产绝种的主流观念下，有的地方仍强调集体养猪。特别是由于私养母猪会出现农民卖猪仔获利的情况，这被认为是产生资本主义，因此多数地方禁止私养母猪。例如，当时上海不准农民私养母猪，把农民养的母猪都作价（实际是无偿）收归集体饲养，还把这一条提到刹住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高度。

1961年，陈云就养猪问题作专门调研。他发现，无论公猪母猪，公养私养，农民的积极性

截然不同。公养猪死亡多，苗猪死亡率高达89%，长肉少，积肥少，浪费稻草，浪费劳动力。私养猪则相反，死亡少，长肉多，积肥多，节省稻草和劳动力，一头母猪一年可赚200元。农民私养母猪，就像对产妇一样关心，对苗猪就象对婴儿一样关心，垫圈时夏天垫青草，冬天垫干草，饲料搭配讲究，母猪保胎保得好。^④

陈云在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坚决主张把母猪迅速给农民私养。他在给中央写的题为《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的调查报告明确指出：“事实告诉我们，要迅速恢复和发展养猪事业，必须多产苗猪；而要多产苗猪，就必须把母猪下放给社员私养，这是今后养猪事业能否迅速恢复和发展的一个关键。”^⑤

第三，提议实行包产到户。

在三年困难时期，鉴于人民公社中的平均主义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为了渡荒，一些地区试办了包产到户（也被称为责任田）。

据1961年10月安徽省对36个县的典型调查，实行责任田的36个生产队，粮食平均亩产比上年增长38.9%，另外36个条件大致相同但未实行责任田的队，平均亩产只比上年增长12%。由于责任田对粮食增产的效果极为显著，到1962年5月，全国已有2000万农户，1亿农民实现了“包产到户”。^⑥

1961年，陈云在调查时，有老农向他反映，秧是插下了，凑合了事，插得不好，要减产。陈云问怎样能不减产？老农说要联系产量，包产到户，以促进田间管理。这事引起陈云的

① 肖冬连：《共和国年轮1961》，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页。

② 《陈云文选（1956—1985年）》，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7页。

③ 金冲及等编《陈云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261页。

④ 参见金冲及等编《陈云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262页。

⑤ 《陈云文选（1956—1985年）》，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3页。

⑥ 朱荣等编《当代中国的农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217页。

深思。

1962年春夏之交，陈云在杭州休养时，看了安徽搞责任田的材料后，非常重视。认为这与他在农村所见、所设想的恢复农业生产的办法是一个路子。

本着对人民负责的态度，陈云决定向毛泽东直接建言实行包产到户。当时，党内对包产到户的问题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认识。尤其是，毛泽东对人民公社化的政策，虽同意进行局部调整，但总体上仍是肯定的。对毛泽东提出包产到户意见，政治风险无疑是很大的。

因此，一些人曾经劝陈云慎重考虑，不必急于提出。但陈云鲜明地表示：“我担负全国经济工作的领导任务，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此事既然看准了，找到了办法，提与不提，变与不变，关系到党的声誉，关系到人心向背，怎能延误时机！”^①

1962年6月24日，陈云回到北京，立即与刘少奇、邓小平等几位中央常委就包产到户问题交换了意见，看法基本一致。7月6日，他与毛泽东谈话，“建议用重新分田的办法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便恢复农业的产量”。^②毛泽东

在谈话时虽然没有表态，但事后严厉批评这种意见是主张分田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是修正主义。

在随后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及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陈云等支持“包产到户”的主张批为刮“单干风”，是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严重错误。陈云因此遭到了长时期的冷遇，离开了最高决策层和实际工作岗位。

本文作者：尚长风是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2011届博士；刘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史系2009级博士生

责任编辑：赵俊

① 参见孙业礼等《陈云的非常之路》，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0、201页。

② 朱佳木主编《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页。

Chen Yun and the Relief Work in the Period of Three Difficult Years

Shang Changfeng Liu Chun

Abstract: As a result of policy failures and natural disasters, severe famine occurred in China from 1959 to 1961, i. e., the Period of Three Difficult Years. Severely criticized, Chen Yun got into extreme difficulty in 1958, resulted from his leading role in the Opposing-Rash-Advance issue. In the early phase of the famine, Chen Yun strived to reduce the loss to the minimal level by expending best efforts. When the famine had widely spread out of control, Chen Yun focused his responsibility on the famine relief and maintenance of people's livelihood. For this purpose, Chen Yun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relief measures, including emergency food importation, streamlining urban population, relieving urban residents, and adjusting the Party's rural policy, etc.

Key words: Chen Yun; the Period of Three Difficult Years; Opposing-Rash-Advance